

多面、更加有趣的话题。而且这样可能也会使我们的读者群更广一点,不仅仅局限于中文和历史的范围,而是可能会让更多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也关注到《文献》杂志,我想这样是不是也能部分地扩大期刊的受众范围和影响力呢?

学术引领者的担当

王博(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

感谢张志清馆长与《文献》编辑部的邀请,办刊方向关系到刊物未来发展,实为大事,晚辈愚昧,借贵宝地斗胆发表一些个人浅见,如有不妥之处,尚请海涵见谅。

贵刊创刊自1979年,40年来陆续披露各种具重要参考价值的古、近代文献,并发表相关研究成果,俨然已发展成为我国文献学领域的一面旗帜,享誉海内外,长期备受瞩目。就目前刊物而言,虽已是极好的,但如能在以下方面加以调整,则更有助于读者研究及学科发展。

其一,目前“文”较重而“史”较轻,两者所占比重并不均衡,后者内容尚有增加余地,以进一步提升对史学研究者的吸引力。如近年来以洛阳、长安等地为中心大量出土墓志等石刻材料,虽存在盗掘、伪刻等诸多问题,但意义重大,俨然已成为继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文书、内阁档案之后的又一重要领域。贵刊今后是否可以增加一些该领域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

其二,通过“专栏”等形式定期反映学术热点,并利用“卷首语”“主笔”直接与读者进行交流和沟通。一个期刊所吸引人之处在于它独特的表达功能,有生命力的期刊,也是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的表达及对当下热门话题加以采撷的意图。现在有许多期刊通过举办小型学术研讨会以提供探讨学术热点的场所,殊不知“专栏”本身便是一个最佳的探讨“场所”和“研讨会”。

其三,适当增加域外汉籍方面的内容,以从整体把握东亚汉籍发展脉络,促进该领域研究。如在东亚,作为印刷术的故乡,历史上东亚汉籍的刊印过程,基本上是沿着中国为中心,周边国家和地区始于模仿中国,此后渐渐各有创造而发展起来的(早期基本为佛经,如8世纪中叶日本奈良时代刊刻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等)。以在中国元明时期民间流行的诗文选本《古文真宝》一书为例,虽该书地位不亚于此前的《文选》和此后的《古文观止》,但由于自明晚期起逐渐被人遗忘,国内极少有其传本,但据朝鲜半岛及日本对其翻刻本加以比较,则可较好恢复其原貌,域外汉籍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贵刊虽名为《文献》，但实则意义重大。原本，于我等从事古代史学研究者而言，因古代文献是研究之基，懂得分辨并正确阅读理解文献正是开展研究的第一步，因此拜读贵刊是日常的必修课。但坦白而言，现如今史学研究者中擅长阅读理解文献者有之，懂得分辨者则甚少。所以辛德勇先生才忧心忡忡地指出，目前引用几无史料价值的著述作为研究依据者不在少数（见《研治古代文史的必备入门书籍——读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收入黄永年《古文献学讲义》，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311页）这一现状。可以说，文献学素养的缺失是横亘于文史研究者面前的一大障碍，而这一障碍却又是非突破和跨越不可的，结合近年来伴随经济发展而起的史学研究热潮，相信贵刊在此际无疑可以肩负起更多的责任与担当。换言之，晚辈盼望贵刊不仅是作为展示新文献、发掘已有文献未知价值的重要平台，如能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在为学术界提供平台的同时，也能反哺学术界，引领促进学术发展，立足于文献，却又不囿于文献，从而更进一步推动文史研究发展，则功劳大焉。

最后，再次向张志清馆长及贵刊诸位先生表示感谢！

从传统文献研究到现代文献学的转型

史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先贤提出科学整理国故，奋力实现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然而至今一百余年，中国的很多学问仍然停留在前近代，并未完成这一转型，尤以传统文献研究为甚。传统的文献研究主要包括古籍的校勘、版本、目录、辑佚、辨伪、鉴定等领域，但是细致分析之后不难发现，这里的校勘、辨伪是研究方法，辑佚、鉴定是研究目的，版本、目录是研究对象，完全不是同一层次的内容，以此概括文献研究显然存在着重大问题。而文献学的一些教科书认为文献研究应当包括从文字、音韵、训诂到义理乃至辞章的方方面面，举凡文献所记载的内容都归入文献研究的领域之内；甚至还有用“‘中国古典’学”来概括传统文献研究的主张。这样的认知必然使人怀疑传统文献研究究竟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还是面向文献的同类研究的庞杂集合。

我们知道任何学科都需要有自己明晰的研究对象、概念体系、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不与其他学科交叉、重叠，这样才能使之成为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文献学恰恰缺乏这样的明确共识。如果传统文献研究仅仅是一种无所不包的面向文献的研究，肯定是无法构成一门现代性学